

导论
微观经济学入门

1

JINGJIXUE TONGLUN

经济学通论

朱乐尧 朱贤平 周淑景 著

ZHULEYAO ZHUXIANPING ZHOUSHUJING ZHU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经济学通论

①

导论

微观经济学入门

朱乐尧
朱贤平 著
周淑景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辽)新登字 16 号

经济学通论

①

朱乐尧 朱贤平 周淑景著

* * *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连市凌水河 邮政编码 116024)
大连海事大学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5 字数:335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 *

责任编辑:刘 杰

责任校对:晓 平

封面设计:孙宝福

* * *

ISBN 7-5611-1089-8
F·215

(上、下册)定价:32.00 元

关于《经济学》及本书

——写在校完清样之后

在科学发展史上,同哲学、逻辑学等思维科学和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及文学、艺术等社会人文学科相比较,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属于一门晚近新发展起来的独立学科,迄今为止仍不过 220 年的历史——如果以亚当·斯密(A·Smith)《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的公开出版算起的话。但是,用“后来者居上”这一句话来形容或表述经济学在社会人文科学中的地位以及它在社会公众中深受尊敬的程度却似乎是再恰当不过的。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凯恩斯(J. M. Keynes)对经济学革命的成功,经济学及经济学工作者更是曾经一度春风得意,备受尊敬,以至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当然,经济学及经济学工作者也有被怀疑、被指责的时候,以至于怀疑它是不是一门科学的人也不乏存在。但总起来看这毕竟是次要的。两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始终被认为是智慧的象征,吸引了一大批的优秀人才进入该领域,以致人类社会中富有创新精神和划时代功绩的伟大学者的名字往往都同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并且在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1615 年,法国重商主义者 A. de 蒙克莱田(Antoine de Montchr'etien)出版了《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是为以“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为名称的第一本著述。但是,一直到 18 世纪中叶之前,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却很难说已经真正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期间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一是局

限于流通领域,二是往往同其他学科如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的研究相融合,成为后者的一种副产品或意外的成果。这一点可以从这一期间出版和发表的有关经济问题著述的名称中清楚地看到。例如,被称之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的威廉·配第(W. Petty),其经济问题的代表作就称之为《政治算术》(1690)、《爱尔兰政治剖视》(1691)。配第的直接继承者J. 洛克(J. Locke),其主要经济问题著作则以《政府论》上、下篇(1680~1690)为名出版。配第之后另一位有重要影响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D. 休谟(David Hume),其主要经济问题论著《论商业》、《论货币》、《论利息》、《论贸易平衡》、《论赋税》等也是以《政治论文集》(1752)名称而问世的。并且,像J. 洛克、D. 休谟等人对哲学的兴趣,始终远高于其对经济学的兴趣。他们首先是作为哲学家而闻名于世的,其次才是经济学家。

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最终形成是以亚当·斯密(A. Smith)《国富论》(1776)的公开出版为标志的。《国富论》第一次把经济知识归结为一个统一的和完整的体系,并把研究的对象由流通领域进一步扩展到生产领域,从而为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系统化奠定了理论及其方法论基础。然而,一个饶有趣味的事实是,即使是在《国富论》的出版大获成功而反响强烈,并使作者名声大振之后,在作者的头脑中,它也只是许多著作中的一本,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其作者打算要写的一部超乎寻常的著作的一部分或一个章节,并且甚至还是不那么重要的一个章节或部分。斯密年轻时是带着对哲学的满腔热情而走向生活的,并始终保持着哲学家的气质和风度。在他的一生中,他丝毫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位专注于政治经济学的专家或学者。《国富论》只是他的一个幸运而意外的收获或成果。用他自己著名的话来说,他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而导向了一个并非自己计划中的目标的”——即把政治经济学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事实上,斯密毕生未竟的研究中最主要

的对象之一,乃是人类的进步与社会发展。他研究财富的增长始终是把它视为这种进步与发展所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而加以考虑的。他对待政治经济学的最终方式也是将其视为诸多学科中一项有限的学科而习惯地予以考察的。由此,《国富论》中的每一个重要论述都无不同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相互依赖和交叉。这一点不仅反映出了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来源及形成的一般特征,而且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学科早期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鲜明个性。

无论怎样说,斯密和他的《国富论》在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对人类事务所起的有益作用,是无可否认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由此而得以成为一门受人重视的学科。由斯密提出并制定的一些新的或经过改造、发展的原理,成为经济学家们继续研究、探索的对象,是启发、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潜心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力量之一。19 世纪初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而几乎与亚当·斯密齐名的大卫·李嘉图(D. Ricardo),据说就是在 1799 年偶然地阅读了斯密的《国富论》而对政治经济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转向研究经济学问题并在这一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事实上,后来的经济学家,无论是那个流派都无不深受斯密和他的《国富论》的深刻影响的。

19 世纪中期之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两个突出而明显的变化:一是过去为人们不很熟悉而很少有人问津的数学推理方法由于受到英国经济学家 W. 杰文斯(W. S. Jevons)和法国经济学家 L. 瓦尔拉斯(L. Walras)的高度推崇和努力提倡而在经济研究中得以广泛的使用和流传;二是由于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这一重大革命再加上其他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政治经济学开始倾向于对经济现象的论证和某些纯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而对于像政治、哲学等方面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如国家政策等问题的兴趣和重视程度则远不如过去那样浓重。问题研究的专门化程度空前提

高。于是有些经济学家便主张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应当以“经济学”取而代之。因为,从词义上说,单一词(economy)比双合词(Political economy)更为简洁明确;从学科研究角度看,去掉“政治”(Political)一词也更符合该学科研究的主旨。1879年英国经济学家 W. 杰文斯在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序言中就曾经明确地表示了这一主张。这样,到 1890 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 A. 马歇尔(A. Marshall)在出版他的经济学著述时便第一次使用了《经济学原理》这一名称。之后,西方经济学界便一直使用“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而不再使用“政治经济学”名称。但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则继续运用“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

学科名称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这一更替,并非是毫无意义的名词、概念之变,而是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学科研究的侧重点及其兴趣的重大转移与变化。对在这之前和之后的经济学著述作一比较,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至于这种变化究竟是否合理、适当,或者是否象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它使得这一学科的研究范围变得过于狭窄而导致其活力的下降,或者正好相反,那是问题的另一方面,需要另当别论。

经济学渊自西方,是西方的科学。迄今为止,在经济学发展的全过程中,它每迈出一个重要步伐,每提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学思想及其方法论基础,可以说都是由欧美国家的思想家们来完成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着 5000 年以上持续文化传统的古老国家,当她已在文明领域中展翅飞翔之时,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甚至还刚刚学着拍打自己的翅膀。然而,虽然如此,中国却没有产生自己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这一点对于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中国人来说,它所意味的就不只是一种遗憾,而是一种难以忍受或启齿的耻辱。但它却是事实,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是 19 世纪中期之后的事情。大约是在

1867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以英国经济学家 H. 福西特(H. Fawcett)于186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指南》一书为基本教材,在北京同文馆开设“富国策”即经济学讲座,最先把西方经济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其讲稿则于1882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取名《富国策》出版发行,成为中国公开发行流传于世的第一部经济学著述。1886年英国经济学家 W. 杰文斯于187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一书的中译本由海关总税务司署以《富国养民策》为书名出版发行,是为中国公开出版的第二本比较重要的西方经济学著作。之后,来自国外的经济学译著以及国内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人逐渐增多。至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出版发行的经济学著述已多达近60种,其中也包括了少量的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西方经济学的著作。

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更是广泛流传。有关经济学的译著和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经济学著述成倍增加。涉及范围已包括西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各分支学科、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在这一期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A.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T. R. 马尔萨斯(T. R. Malthus)的《人口原理》、J. -B. 萨伊(J. -B. Say)的《政治经济学概论》、J. B. 克拉克(J. B. Clark)的《财富的分配》以及C. 里斯特(C, Rist)的《经济学史》等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著述在中国均有中译本而相继出版。由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经济学著作较为流行和较有影响的主要有刘秉麟的《经济学》、赵兰坪的《经济学》、马寅初的《中国经济的改造》和《经济学概论》、徐毓枬的《当代经济理论》等30多种,其中刘秉麟、赵兰坪的《经济学》还再版多次,前者再版十余次,后者则印行了26版。

1949年后,中国向当时的苏联一边倒。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乃至大学院系及其经济学类专业的设置、全部课程的内容、教学大纲、学科建设方向等均照搬苏联,全盘“苏化”。而对于西方其他当

代经济学则一概视之为庸俗的经济学而加以排斥,拒之门外。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觉察到苏联经济学理论的严重缺陷及其对中国的不适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便转向对马克思经济学经典著作的中国化注释。这样,发展到1978年,原有的格局已难以维继,中国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于是,很有点“三十年风水轮流转”的味道,中国经济学界又开始逐渐地转向西方当代经济学,试图从这里寻求到某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某种基本理论和方法。

这就是中国经济学或者说经济学在中国所走过的基本历程。

从1867年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到现在,一百多年来,历经世变苍桑、风风雨雨,中国每年所出版的经济学书籍早已数以千计(种),公开发表的经济文论则数以几万计(篇),国内研习经济学和专门从事经济问题研究及教学的人也早已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队伍。就经济学所涉及的学科、领域、范围、流派等而言,凡是国外有的,中国也都能够见到。但是,尽管如此,中国依然还很难说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经济学。中国目前的经济学,从理论体系到具体的概念范畴、从哲学思辨到具体的方法、从价值观念到一般的行为规范及准则等等,无一不是西方当代经济学和来自西方其他经济学流派的那一套东西。虽然其中有些已经经过了学者的某种改造或重新阐释,但却都是以外国公民在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依据其所熟悉的社会经济活动并以他们所熟悉的思维方式而建立起来的理论学说为基础的,就其本质而言,依然属于外来经济学的范畴,是西方的科学。问题就在于,由外国公民所创立的经济学说与方法,无论它们在其本土上的效用与业绩如何,但却未必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具体情况不同于外国,有具特殊性或个性。

导致中国经济学如此现状的原因显然是复杂的。除了因为中国经济学有着严重的许多先天不足之外,更为重要的或许还是在

它后来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一种非理性的严重状态。它思维的方式是那样的幼稚,脾性是那么的易变,观念是如此的浅薄;有些许的经典主义,也有些许的浪漫主义,而更多的则是简单的“拿来主义”;缺乏保持平衡的批判思维能力,无视或不愿意看到国内的真实情况及其与他国间的巨大差异;对于本国的传统特别是中国所特有的,有时是那样的不耐烦,而有时又是如此这般的固执偏颇,絮絮叨叨;极端地轻信一年一度的思想新“模式”,缺乏心理的稳定因素,然而有时又“稳”得出奇,以致僵化到长期抱住某些陈词滥调而不放;年复一年的概念之争、名词游戏、“主义”之战,时而小心翼翼、谨慎过头,生怕越雷池半步,时而又耽于声色、嬗变无常、言辞激荡,令人目不暇接。所有这些便塑造出了中国现有经济学的某些基本特性。

中国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与有效运行,需要有属于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指导。如果认为经济发展可以不要经济学的指导,可以不进行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并建立自己的经济学,或者至多只需要讨论和论证日常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与要求,或者可以依赖于国外的“舶来品”,照搬国外的某种理论学说,完全使用外国公民所创立的经济发展思路与方法,那就再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事情了。按照这样的思路发展和运作经济,是没有不陷入失败的境地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如何建立真正属于中国并足以有效指导本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经济学,便成为中国经济界所面临并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

于是,问题便归结为,中国能否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学?答案应该说是清楚的、肯定无疑的。中国文化不只是历史悠远,而且博大精深。秦朝以降,历经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两千多年来,在长期的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和丰富经验,先后总结并提出了不少不乏精辟、颇富哲理的经济学思想或经济思

想。对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些经济学思想的系统化处理,即可成为创立中国经济学的直接基础。不仅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还为中国经济学的重建提供了良好的方法论基础和更为广阔的理论思维的背景资料或智慧的营养。“半部《论语》治天下”,中国文化的一句至理名言。作为儒家经典的《论语》,它虽然没有明确而直接了当地告诉人们如何治理国家,更没有告诉什么孔门技巧或对策之类,它所讲的都是一些大的道理和原则,但这些道理和原则却给了人们以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智慧与灵感。

还有老子《道德经》,虽仅五千余言,但两千多年来却注家蜂起,其中所蕴含的精深哲理贯穿于中国各历史阶段的各个领域,各家都引其哲理为其所用。哲学家奉其为东方哲学之经典,政治学家认为它是可供借鉴的治世名言,军事学家说它是一部攻防战略的用兵指南,养生学家将其视为养生的原始理论依据,而阴阳风水先生则将其作为推演“天机”之秘鉴,如此等等,真可谓见智见仁,或褒或贬,或扬或抑,至理乎?邪说乎?科学乎?戏言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至于20世纪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发现,“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们没有走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都做出来了。”而美国从事高能物理研究的卡泼博士则说:“中国的哲学思想提供了能够适应现代物理学新理论的一个哲学框架,中国哲学思想的‘道’暗示着‘场’的概念,‘气’的概念与量子‘场’的概念也有惊人的类似”。凡此种种,既然其他科学学科都可以运用老子之哲理为我所有,难道经济学就不能够?我想是应该可以和完全可能的。

创建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必须使经济学

的理论大厦得以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以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认知方法作为经济学理论思维的出发点,彻底改造和重新构建经济学的理论规范及其认知的体系与方法。具体地讲就是:

——以中国文化的价值心态、价值观念和价值准则构建经济活动的理论规范及其行为准则或规则,对于以西方文化价值系统为基础的经济学范畴、理论规范及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等加以重新阐释和认定,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学西方文化的理论价值基础。

——以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科学哲学改造并构建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使之更加符合中国文化在认知方法、哲学思辨上的突出特点,从而使在此基础上产生、形成的经济学理论及方法等更易为中国的公众所认同和所接受。

——充分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社会人文背景或环境特点,加强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及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评价,通过对旧价值的再发现、再评估、再认定,达到对新价值的发现、评估、肯定的目的,从而发掘并强化有利于现代经济生活与社会发展的传统经济观,而对于其不利的方面则予以彻底的消除或有效的限制。

——拓宽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协调经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相互依赖,打通经济与政治、文化的联系渠道,建立“政治(权威)—经济(市场)—文化(说服、教育)”有机结合、互为补充的经济运行与发展机制。

实现上述各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少是在当前不可能一蹴而就。另外,经济学的改造或重建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全盘否定经济学的过去。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当自然科学家达到了知识的尖端并准备新的探索的时候,他们未必能从对他们的前辈所走过道路的沉思中获得许多东西。陈旧的思想已经

不能再用,旧时的论战已经消声匿迹”。而对于经济学来说却“不可能用同样的方式去逃避我们的过去。我们可以自封为摆脱了往昔;但往昔依然笼罩着我们。‘新古典主义’继承‘新重商主义’,凯恩斯和他同时代的人重复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观点;马克思和马歇尔依然‘活着’。我们中的一些人有以这种传统主义为耻辱的倾向,但当它被完全理解后,窘迫就没有理由了”。^①

J. R. 希克斯(John R. Hicks)的这一番话是对的。经济学每前进一步,包括经济学新理论的提出、新体系的建立、新方法的确认等等,都必须在经济学现有的基础上实现。就我们所面临的课题而言,中国现有及外来经济学的某些内容,包括某些理论和方法论原理、有关认识、分析经济问题的具体方法及思维方式等,经过选择和改造,是完全可以成为重建和发展中国经济科学的有益资料的。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必须熟悉它们,了解它们的性质和效应。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早在五六年前,我们就试图编写一本能够比较适合中国特点与需要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而作为该设想的第一步,是编写出版一本内容尽可能全面、体系尽可能完整、涉及的领域与范围尽可能宽泛一些,能够较为充分地反映和体现国内外经济学基础知识的全貌,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文字通俗易懂,内容深浅相兼、难易结合,为适应有志于经济学研习或对经济学有兴趣不同层次人学习需要的经济学基础读物。

于是,便有了本书的写作冲动,有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经济学通论》本身。

《经济学通论》由四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所组成。导论,微观经济学入门,宏观经济学初步,国际经济学基础,共计 32 章。

“导论”简要介绍经济学对象、方法、学科体系和经济学理论的

^① 约翰·希克斯:《经济学中的“革命”》1996 年版,第 207 页。

作用与限度、经济学的进步与发展等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

“微观经济学入门”按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基本思路展开,较为全面、系统、详尽地介绍了微观经济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所涉及的有关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的方法。具体内容包括:市场供求与市场竞争、生产的组织与要素投入、厂商区位、商品的交换与销售、收入分配、企业投资与技术进步等。

“宏观经济学初步”涉及政府与经济、国民产出决定、投资与消费、财政收支、货币与银行、社会就业、通货膨胀、产业配置、区域经济与城市、经济增长与发展、宏观经济均衡等经济问题以及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路和具体的方法等。

“国际经济学基础”介绍有关国际收支、汇率决定、国际货物及服务贸易、国际投资、跨国经营、国际货币与金融、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的管理等方面的经济理论与方法。

通观全书,它具有视野开阔、覆盖面广、内容宽泛,且前后贯通、上下协调、层次清晰、结构框架较为合理、体系较为严谨,与现有一般经济学原理著述不雷同的突出特点。

本书是我和另外两位作者朱贤平先生及周淑景女士精诚合作的结晶。周淑景女士长期专司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而朱贤平则在政府经济部门从事经济工作十数年,实践经验丰富。两位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均较为扎实,颇有著述。三人合作,可谓得心应手,而我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也获益匪浅。

本书框架由我首先提出。但实际上从大纲的形成一直到最终成书的全过程,三人始终坚持共同磋商、“分工不分家”的通力合作原则,即使是分头撰写各章节的具体内容时也是如此。各章节的初稿完成后,三人间数次交换原稿,反复推敲并增删有关内容。最后由我对全书各章节的初稿作统纂处理,最终裁定其内容。因此,本

书成果是三人共有的,而其遗误错漏则由我负完全的责任。

本书的形成参阅了数十部经济学专著及教科书和大量发表于各种报刊杂志的经济学论文,直接借鉴、引用了百多名作者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出版费用昂贵),为了尽可能地缩减篇幅和印刷量,节省出版费用,被借鉴、引用成果的名称及其作者高姓大名,我们无法一一列出。对此,我们只能表示衷心的感谢。但对于这些作者及其成果,我们将铭记在心、感激不尽。

本书得以公开出版,是与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全体教师、编辑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和鼎力相助所分不开的。特别是编辑室的刘杰老师,更是为本书的出版倾注了心血,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对刘杰老师、对出版社的诸位领导以及出版社其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老师、编辑及所有员工,我们一并表示真挚的谢意。

本书的问世,我还应该特别感谢东北财经大学的老师们。这不仅是因为我在东北财经大学整整 12 年的教学生涯中,这里的老师们曾给予了我无尽的智慧和力量,我是通过他们的肩膀而攀入经济学这一科学的殿堂的,而且还因为在我最困难、最需要人理解、帮助的时候,又是他们给予了我生活的机会和希望,而这时的我调离东财已经是多时了。特别是以下几十位老师所给予我的援助是无法以言辞确切表达或以金钱能加以计量的。他们是:夏德仁教授、于泽教授、宋广发教授、郭长禄教授、金凤德教授、张宇霖教授、孟庆学教授、饶会林教授、刘昌黎教授、于立教授(博士)、王栋教授、刘长新教授、刘思贤教授、刘维中教授、刘淑文教授、艾洪德教授(博士)、孙洪志教授、邱东教授(博士)、张一民教授、张先志教授(博士)、张勇中教授、陈岷岷教授、林乐明教授、贵立义教授、姜兴渭教授、战殿学教授、赵松山教授、徐世龙教授、黄刚教授、解学智教授(博士)、蒋萍教授(博士)、蔡世馨教授、薛俊杰教授和王询博士、卢昌崇博士、王庆石博士、王维国博士、刘明辉博士、白雪梅博士、冯云廷博士、刘英群博士、孙开博士、杨青博士、李秉祥博士、

李强博士、武献华博士、赵苑达博士、郭庆旺博士、高良谋博士、寇铁军博士以及周竹南副教授,还有大连人寿保险公司金宗项副总经理、大连声光塑料机械经销公司李玉良总经理、大连北方城市信用社辛惠芳主任、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市分行资金调节市场胡声总经理等,我都将终生难忘。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的即时出版也是无法想象的。

朱乐尧

1996年元月25日于大连

序 言

——何妨不学点经济学

一、无处不有、无所不在的经济问题

人世间所面临的问题各种各样。人们尽可以将这些问题按其属性加以分门别类,例如,分为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环境生态的等不同类别或属性的问题。但是,无论是什么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都是由经济问题所衍生、演化出来的,或者可以转化为经济问题,或者说都可以从经济上找到它的原因、根源或形成某种经济后果。因此,经济问题无处不有、无所不在。人们每时每刻都在接触经济问题,呼吸着“经济的空气”。

例如,人们的衣食住行以至起居作息,其中就有或者就是一个经济问题。一个人为什么穿这样一种衣服而不是那样一种衣服?为什么常吃这样一类食品而不是另一类食品?为什么住这样的房子而不是那样的房子?为什么骑自行车或挤公共汽车而不乘坐小轿车或“打的”?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偏好吗?难道不是与他的经济收入水平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有着某种直接的关联吗?个人的经济收入低,便决定了他只能吃较多的廉价食品、穿较便宜的衣服、住简陋的房子、骑自行车、挤公共汽车等等。相反,如果他的经济收入高,他就可以吃得丰盛一些,穿得富贵一点,住得豪华一些,出门便可“打的”或自备小轿车以“车”代步。

上面所讲的是日常经济生活问题。文化生活又如何?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常看电影,而另外的人则不能?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常常